

## 艾滋病肆虐——是关注社会健康， 还是只谈疾病医治\*

白 梅

艾滋病（AIDS）的肆虐，给整个地球村带来的深远影响，是过去的任何疾病都不及的。艾滋病和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的流行，驱使我们参与一场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国际行动中来。在这场行动中，我们既要探讨人们私生活中最隐秘的方面，又要关注社会与经济现实中涉及公众生活的重大课题。尤其是那些已经被艾滋病夺去了亲友和同事的人们，更对我们的工作抱有强烈而急切的期待。艾滋病和HIV病毒从此改变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

我们聚集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都认识到，现在我们开始面对的，已远远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众所周知，在我们栖身的这片土地上，尚无控制艾滋病的任何技术手段，既无治疗的药方，又无预防的疫苗。能取代医学技术手段的应对良策，只能是我们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及社会经济环境的认识，采取全面的、细致的、多方面的和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

我本人在中国工作。对于今天到会的我的许多同事来说，这次讨论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会。因为，艾滋病在中国尚处于发生的早期阶段，我们还来得及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会议获得其他地区人们的经验与教训。

我要谈的话题最简单不过，就是健康。人们谈论吸毒、性与经济、法律等等，倘若稍有疏忽，便会遗漏了健康这个关键，而健康恰恰是我们工作的全部要义。的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认识什么是和如何保障人们的健康。如果我们仅仅关注犯罪或疾病，强调监测问题或丧失劳动力问题，我们就将误入歧途。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健康问题上，包括社会健康与性健康。

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我来自美国，我认为，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大多数美国人，最终连美国的新闻界，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巨资去对付吸毒、贩毒，结果是一场败局。今天，美国的吸毒者比禁毒运动开始时大为增加了。其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正是在于美国政府的作法未能对造成毒品在美国泛滥的诸多社会和经济因素给予足够的考虑。政府对这些因素甚至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政府未能认识到社会的“健康”何等重要，因而不去创造健康社会所必需的条件。有效的禁毒计划原本应当以社会健康为目标并努力去达到这一目标，因而我们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工作就必须以性健康和促进性健康为目标。

当HIV病毒和艾滋病出现之初，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病”的可怕性上，放在它对生命的威胁上，这是自然而然的，不足为奇。艾滋病确实可怕，确实对生命构成威胁。然而，教育工作者们都清楚，消极的信息传播使信息的长远价值受到限制，只有积极的、正面的、有说

\* 此文为美国福特基金会生育保健与妇女研究项目负责人白梅女士在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云南省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于1992年9月在昆明联合召开的“艾滋病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国际研讨会上所做演讲的摘发稿。

服力的信息才会促进有利的和持久的变化。尽管是疾病问题把我们召唤到一起的，我还是要呼吁同仁们把注意力转向“健康”这一目标，以便去探究真正的性健康意味着什么，去探索我们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究竟应当走什么样的健康之路。

在2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计划生育工作部门大大地忽略了性教育问题。他们全神贯注于技术措施，依赖这些措施去推迟或防止怀孕，似乎并非首先是人们的性行为才使技术干预措施变得必要。

最近十几年来HIV和艾滋病肆虐的情况，再也不允许我们大胆忽视性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公开地、不加臆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人在与什么人发生性行为？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性行为？为什么要发生性行为？提出这些问题，不仅是为了预防疾病，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确保健康的目标。

性的健康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人们知道什么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性行为，有决定自身性行为的权力。知识和权力是问题的核心。

中文里的“危机”一词，是由“危险”和“机会”两个字组成的。对艾滋病问题讳莫如深、不愿公开宣传和教育是危险的，我们大家都已清楚地知道这一危险；我要建议大家同时去抓住其中的机会。我们可以在两方面去努力：第一，借助这一机会，进行坦诚而直接的信息交流，开展合作与批判，尽可能从这一机会中吸取知识，获得教益；第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要利用HIV和艾滋病强加于我们的机会，去探索一条通向健康社区的路，使社区里居住的男女，个个都具有健康的性行为。只有这样，我们的探索才可能开辟一条引导人们摆脱艾滋病灾难的出路。

(陈一筠译)

## 《中国当代性文化》等书出版

△中国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成果《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已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6月出版。主编为刘达临、特约主编吴敏伦、副主编仇立平、顾问E·J·黑伯乐。全书包括两个序、六章、三个附录和后记，共计67.7万字。平装本定价30元，精装本定价35元。

△常向群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已于1992年7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6.6万字，定价9.70元。

△郭于华著《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7月出版，全书16.8万字。

△林国灿主编、王育民副主编《现代社会学》于1991年11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32.6万字，定价5.75元。

△王中宪著《社会学理论建设的迫切问题》已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6月出版。全书九章，18.5万字，定价2.80元。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富永健一著《社会学原理》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译为严立贤、陈婴婴、杨栋梁、庞鸣。全书32.2万字，定价7.50元。

△李培林、姜晓星、张其仔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全书31.5万字。定价7.90元。

(张)